

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 啟蒙運動，1895-1925》*

容啟聰**

丘為君著《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為近年較詳盡地從國際因素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著作。作者首先於導論中指出從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層意義。狹義的啟蒙運動是指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廣義的啟蒙運動，則指甲午敗於日本後中國知識人所開啟，長達三十年並帶領中國人走進現代世界的一個轉型時代（1895-1925）。作者把全書分為兩部分，探討整場運動如何由「精英式啟蒙」轉化為「大眾式啟蒙」。「精英式啟蒙」是指由少數知識精英由上而下地向大眾讀者介紹如民主、憲政、物競天擇等現代觀念的「重型知識」，改造他們成為具群體意識，並明白自身權利與義務的現代公民。「大眾式啟蒙」則指大眾讀者通過閱讀各種報刊雜誌的報導，去理解西方社會政治和物質生活。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以梁啟超、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人為例子，探討清末民初那種謀求創新的精神和群己之間的衝突與張力如何影響著這年代的知識人，並說明對新思潮的追求如何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前後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知識階層興起。自此，普遍中國知識人均認為社會主義將會是世界政經發展的大趨勢，而實行社會主義亦標誌著一個地方進入現代世界。進入本書第二部分，作者即探討「歐戰」對中國啟蒙運動的影響。丘氏先說明中國知識人如何藉報章雜誌報導「歐戰」的消息，使此前的「精英式啟蒙」轉化為「大眾式啟蒙」。通過閱讀最新鮮的「歐戰」報導，大眾讀者了解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具體內容、國外政局的發展、國際軍事衝突的殘酷，並切切實實地意識到他們已生活在現代世界。同時，作者以陳獨秀為例，探討中國知識人如何理解「歐戰」，並通過對「歐戰」的思考形成激進的世界觀。最後，作者通過分析《甲寅雜誌》與《新青年》的文章，

* 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 香港大學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策劃編輯

討論了「歐戰」爆發後中國知識人對國家、革命、國體、主權和統治權等概念的理解和想像。

本書突破之處在於說明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有著雙軌的發展。先由知識精英由上而下向社會知識大眾引介各種現代觀念。「歐戰」的爆發令知識人和知識大眾更主動地去理解現代世界。在作者眼中，中國啟蒙運動並不局限於精英知識人，亦不只限於短期的「新文化運動」，而是一個橫跨社會各知識階層的一股潮流。老一輩的知識人在晚清率先接觸到西方文明，並對其理解、演繹和詮釋，再通過興辦新式媒體如報章、雜誌等，進而引介給年輕一輩的讀者。三十年時間過去，中國人亦正式從前現代社會走進現代世界。

作者先以本書前半部分的篇幅去梳理轉型時代中國知識人對各種現代概念的理解。這能讓讀者清楚了解到啟蒙運動的歷史背景，使他們閱讀第二部分時更易掌握「歐戰」對啟蒙運動的影響。而書中對於創新精神和群己關係的兩個章節亦為相關研究提供較為清晰的討論。以梁啟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作個案研究能涵蓋不同世代和政治光譜的知識人，從而對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作一整體性的研究。這樣一來，不但加強相關討論的說服力，亦為後半部分有關「歐戰」的討論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本書的下半部分，作者以「歐戰」訊息在中國的傳播作為切入點去理解啟蒙運動，是相當合適的。「歐戰」是 1910 年代世界的頭等大事。有關「歐戰」的消息除了幫助中國人去了解現代世界，亦使知識大眾正式意識到世界並非環繞自己國家而發展。中國只是世界的其中一部分，歐洲各國自有他們的歷史發展進程。自此，中國人普遍放棄朝貢體系的天下觀，轉而接受萬國林立的世界觀，明白到中國只是世界各國之一，亦並非先進國家。身在中國而觀看「歐戰」，也令中國知識人和知識大眾對何謂國家有著新的看法，激發起民眾的愛國主義。

至於第六章論及《甲寅雜誌》中章士釗與《新青年》中陳獨秀對於各現代政治概念的討論，也是近年有關啟蒙運動的著述中較為創新的關注點。《甲寅雜誌》於 1914 年至 1915 年間發行，為期只有一年半，向來為學術界所忽略。作者通過章士釗在《甲寅雜誌》刊登的文章，探討其對於國體、政體、主權、統治權的看法，並

指出《甲寅雜誌》為稍後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作者亦指出，《新青年》時期陳獨秀有關愛國心和國民性等概念的闡釋，亦與其最初發表在《甲寅雜誌》的文字一脈相承。

綜觀全書，《啟蒙、理性與現代性》以新穎的角度去分析清末民初的啟蒙運動，不但對「轉型時代」的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多層次的理解，也為華文學術界的「歐戰」研究提供了一個思想史研究方向。作者以全球性的「歐戰」去比照中國啟蒙運動的發展，也是頗為嶄新的嘗試。中國的啟蒙運動，固然是受到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所啟發。但丘氏研究一世界性事件對啟蒙運動的影響，卻是學界所少見。他把啟蒙運動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去觀察，也為學術界的新晉學人，尤其是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對象。無獨有偶，筆者現正進行一個冷戰氛圍對 1950 年代港臺流亡學人的研究，與丘氏的研究方法亦有相似的地方，此刻讀到丘氏新著亦獲益良多。跟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1950 年代的臺灣與香港出現不少由知識人所出版，宣揚自由和民主等理念的報刊雜誌，如《自由中國》、《自由陣線》、《祖國周刊》和《民主評論》等。這些報刊亦刊載冷戰時期國際形勢變幻莫測的消息，使讀者更能明瞭他們所身處的時代，以及如何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前景作出貢獻。這些冷戰時代的刊物與《甲寅雜誌》和《新青年》一樣，擴闊了讀者的世界觀。當中不少撰稿人也頗能結合當時的冷戰形勢去宣揚他們的理念，使讀者明白自由、民主和人權，何以在其身處的世界顯得重要。由此看來，這也可算是冷戰早期的一種「大眾式啟蒙」。

雖然本書取材新穎，卻難免有可待補充之處。作者把討論集中在民初的社會主義者，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以及自由主義者如胡適等，卻較少論及同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作者對調和論的討論集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卻少有談及其文化方面。其實，調和論也有其調和中西文化之意思，作者可對章士釗、杜亞泉、吳宓和梅光迪相關的論述加以分析。此外，「歐戰」對當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歐戰」的爆發使不少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杜亞泉和張君勱等認識到西方文明的脆弱和戰後歐洲的文化危機。亦使他們更著意思考中國文化如何能夠彌補西方文明之不足。作者在將來的論著中，可以對這方面作更深入的探討。

最後，筆者期望學者們能繼續把中國思想史置於世界史的框架中，以望釐清中國思想史與世界政經發展的關係。

（責任編輯：張文綺）